

余秋雨言说的文化人格与浙东地域文化

王彩萍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检视与发掘, 对当代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余秋雨言说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格汲取了浙东地域文化的精神元素。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是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 余秋雨的人生设计和生命选择中承袭了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 余秋雨对强健人格的看重和对知识分子驾驭现实人生能力的强调都具有浙东地域文化的因素。

关键词: 余秋雨; 文化人格; 浙东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09)05-0019-05

余秋雨在中国人文山水间行走, 成就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文化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表达现代人面对历史文化遗迹时的感悟与感慨, 意绪自然是含混而多义。但是其中有一个意绪是我们能够较为清晰把握得到的, 那就是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迹的实地考察中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检视与发掘, 对当代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呼唤。当我们在做余秋雨与浙江地域文化联系的研究时, 发现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渗透了其家乡浙东地域文化的诸多因子。

文化人格主要呈现在以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身上。知识分子在传承某种文化体系的过程中受到此种文化的深刻浸润, 久而久之, 文化逐渐深入其血肉, 内化为他们的生命行为, 形成特有的文化人格。文化体系与个体的文化人格是一种互为表现的关系, 文化人格是文化体系在个体身上的积淀, 文化体系又依靠个体的文化人格获得彰显。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的文化人格体现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文化正是靠着这一个个有生命的文化个体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长河, 展示其核心价值观, 显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发展。在中国传统社会, 儒家文化塑造了士阶层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心系国家与民众的文化人格, 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杜甫“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醇”,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直到清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体系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绵长而深刻的塑造之功。进入现代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他们以儒家传统建立了自己的生命根基、人生间架, 又吸收了西学, 既吸收了西方科学, 又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他们以融汇古今中西的视界建构中国的现代文化, 预示了中国文化在现代社会良好的展开。但是, 经过百年历史的曲折,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似乎变得模糊黯淡起来, 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模糊黯淡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了提纲挈领的灵魂, 亟需文化人格的重新凝聚与再造。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课题。余秋雨文化散文中时时表露着的对健全文化人格的向往与追求, 不仅来自其内部生命的要求, 也回应了时代的大课题。

余秋雨是浙江余姚人, 直到小学毕业才离开家乡进入上海。浙江余姚按照文化地理的划分属于浙东。浙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 浙东浙西虽然只有一江之隔, 但是地域文化不同, 浙西与苏南(江苏南部)构成了吴文化的核心地带, 浙东属于越文化圈。吴越之地(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

收稿日期: 2009-05-26

基金项目: 浙江省教育厅项目(20070737)。

作者简介: 王彩萍(1968-), 女, 河南林州人,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博士。

解的江南之地)虽然历来人文荟萃文化郁勃,但是在这个大文化圈之内,吴文化与越文化还是有区别有变化,基本的区别、变化就是从吴文化向越文化越来越由柔美飘逸向理性务实耿介刚强过渡。浙东文化的特殊性在于与别的地域文化相比,它属于江南文化,但是在整个江南文化中又自标一格,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浙东地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其他的地域文化特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精神而展开。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原型大禹的传说中孕育,流贯于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精脉,在浙江当代实践中也有鲜明体现。

在大禹与浙江的联系中,正统的说法是大禹乃越人的始祖,越人是禹的苗裔^①。另一种说法是大禹是越人的神话传说人物^②。在这两种说法中,无论哪种说法都点明了大禹在浙江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原型的意义,说明了越人(历史上的越国主要占据浙东)对大禹的认同和大禹精神在浙东地域文化精神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大禹精神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摒弃空言,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庄子·天下》中借墨子之口对大禹有这样的评价:“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并且进一步阐述墨家为“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现代浙东人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对大禹的描述是“卓苦勤劳之风”,在小说《理水》中更是用刀刻般的笔触画出了大禹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魂。大禹的卓苦勤劳之风奠定了越人脚踏实地拒绝虚飘的民风民性。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自始至终自北至南发生着笼罩性的影响。在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是一种重要思想取向,但是它是由“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功夫推导出的外王之路,与内圣相互制衡,而且在儒家文化的道统中,有一个心性之学逐渐加强,内圣功夫逐渐强于外王之路的趋势。而在浙东这块土地上,从汉代开始,也自始至终贯穿了一条与主流儒家道统相对的强调实学、强调事功、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流脉,这就是浙东学派,它作为主流儒家思想反思者的角色而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地域特色。浙东学派独标一格始自东汉王充。在当时士人大多以“习经证经”、“不知难问”的态度求学,唯经典、圣人之言是从的社会氛围中,王充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实学,为后来的浙东学人奠定了“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和“实学”的精神宗旨^③。王充之后,在浙东学术文化的赓续中,虽然各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有所变化,但是其中贯穿着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却是一脉相承。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明清之际浙东大儒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都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

浙江的这种经世致用精神沉潜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直接作用于当代,使浙江创造了一个个新时代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飞速发展,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是在经世致用的地域文化精神的支配下抓住了发展经济这个总目标,发挥浙江人的聪明才智用足政策用好政策,发扬禹墨的苦干硬干拼命干的精神取得的。浙江现象、浙江精神,归根结底,是这种经世致用精神产生的现实硕果,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

余秋雨出生在浙东这块硕儒辈出、讲究经世致用的土地上,对浙东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精英文化有一种自觉的文化认同。在《乡关何处》中,余秋雨自豪地历数出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硕士鸿儒: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认为自己“闻其风,汲其流”,得到了乡贤神秘、无形而悠长的人格传递,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谱系,安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言说和自身的人生设计中,浙东地域文化尤其是浙东学人的人格风范是其重要的精神资源。

首先,余秋雨的人生设计和生命选择中承袭了浙东学人强烈的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处在书斋,他们在研究、讲授、著书立说中完成知识的循环。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是学术传承、文化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书斋生涯容易出现的一个负面因素就是与现实人生的脱节,从而形成纸上谈兵,对社会无益,对个人也是徒然的生命浪费。这种情形,歌德《浮士德》把它称之为“知识的悲剧”。余秋雨一开始和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一样走的是同样的人生步履,但是浙东学人的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在他血液中奔突,在久坐书斋之后,余

秋雨作出了“出走”书斋的决定。“出走”是余秋雨的生命选择，余秋雨有两段话比较明确地说明了其意图。一段是《文化苦旅》序言中的发问：“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有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了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1]另一段是他在“出走”十五年之后的回顾：“十五年前那个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能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2]这两段话道出了余秋雨“出走”的现实考虑：一是对自身在皓首穷经的书斋生涯中变得萎顿的生命进行拯救。二是目标指向自身与现实社会的密切结合。我们看到此后的余秋雨实践了这些人生计划。他对人文山水的实地考察，无形中接续了浙东学派从王充就开始的跳出书本、跳出圣人之言，从生活实践、自然万物的实地观察中获得对于经典的验证和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学术思路。学术与现实人生的密切结合使余秋雨走出了别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成功。成功意味着在社会上获得了更大的发言权，余秋雨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了更大的发扬。成名后的余秋雨表现出极高的参与社会实务的热情，诸如参加凤凰卫视迎接新千禧年的环球考察，出任青歌赛的评委，等等。余秋雨的这些举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毁誉参半，但是他的选择无疑是一种基于自身生命体验、基于个体自我实现、基于地域文化影响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的选择。它的正面意义在于，正如余秋雨所言，参加这些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参与，一种文人直接参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举动。

其次，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还突出了对强健人格的看重。余秋雨在提及古代知识分子时候，许多地方突出了“强健”这个字眼。余秋雨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强调与向往，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负面因素的观察基础上，又远绍浙东文化的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互补，它既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担当社会责任的历史使命感，同时也为知识分子开辟了逍遥物外，超越人间是非，获得精神自由的空间。担当与超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两极，两者中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优缺点就产生在这巨大的张力中。尤其是道家的逍遥与超越，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了在接受沉重的社会责任之外精神自由的空间，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逍遥与超越本身就来源于庄子对纷乱世事的逃避，是一种避世哲学，后来的历代知识分子采用逍遥与超越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含有避世的因素。道家的逍遥与超越作为一种文化结晶，最终凝聚为中国知识分子对生活作艺术化处理的文化传统。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既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同时也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卑弱的一面。很多时候，把生活作艺术化的处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制作的逃避现实人生困境的独头茧，当无力与外界抗争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钻进这个自制的独头茧，使用忘却的法宝，逍遥物外，自得其乐。

江南之地本是中国文人传统最为深厚的地方，追求艺术化的生活是江南文人传统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余秋雨是一个江南才子，本身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江南文人积习。但是浙东地域文化的影响使余秋雨对这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反感，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余秋雨对西湖的腹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西湖是江南文化的典型物化形式，余秋雨却对之大加挞伐。他看不惯西湖所反映的江南文人的精致与柔弱，认为西湖的水太软，“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3]⁽¹⁴⁷⁾西湖边上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是中国文人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一个极致，一个符号化象征，但是在余秋雨看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3]⁽¹⁵⁰⁾是人格的萎靡不振，是对现实人生失败的溃退。相对于这种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

格上普遍的负面因素,浙东学人因为崇尚经世致用,崇尚实事实功,有“实”作基础,生命质地自然地硬起来,强健人格是讲究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文化人格的一种自然延伸。在余秋雨对浙东大儒黄宗羲的介绍中,余秋雨念念不忘的是黄宗羲作为一介书生,手持一把铁锥,锥刺魏忠贤余孽,一连刺伤八人,把整个京城都震动了。黄宗羲的举动改变了人们对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的经典印象,透射出他性格的强健。余秋雨向往这种强健性格,向往“粗糙的灵魂”,他言说道“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4],他倾心于一种壮大的人生境界,自述喜欢霜冷长河的雄伟画卷,“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5]

第三,余秋雨在对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的言说中,还突出了对知识分子驾驭现实人生能力的强调。如果说,强健人格主要指向内在的心灵状态,那么驾驭现实人生能力主要体现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余秋雨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强调与向往,同样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负面因素的观察基础上,又远绍浙东文化的因素。

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文化传统的影响,先天具有一种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文化培养了他们精致的文化品位和高远的理想,他们生来似乎就是要担负天下大事的,但是对于实际的现实生活反而有着相当大的隔膜,缺乏驾驭现实的能力,“百无一用是书生”是人们对传统读书人的经典印象。在余秋雨看来,这也是一种文化人格上的卑弱,所以余秋雨言说的知识分子健全文化人格,还包含了对现实人生的深切了解和把握因素。在他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读书读得好只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驾驭现实人生的能力。余秋雨对他的乡贤王阳明、黄宗羲等赞不绝口,在于他们不是禄虫书蠹,而是对现实有着深刻的介入,全面发展了他们的才华,建立了盖世的功业。像王阳明,不仅是出色的文臣、哲学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天才,建立了巨大的事功。黄宗羲在改朝换代之际,召集义军、结寨为营,失败后立即投身学术,很快以历史泰斗和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形象巍然挺立。浙东学人的人格风范为余秋雨作出了榜样,重视驾驭现实人生能力成为余秋雨一个基本的心理评判原则,在很多地方贯穿了这条思路。在《风雨天一阁》中,他认为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拥有一种“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正是这种文化人格使天一阁历千余年而不倒。余秋雨拿来与范钦作对比的是藏书家丰坊,他认为,丰坊是一个比范钦出色的文人与学者,但是他的藏书楼之所以没有绵延下来在于他文人的性格缺陷,“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一句话,丰坊的人格中太多文人的软弱与不谙现实,对现实人生没有驾驭能力。余秋雨从浙东精英文化中汲取了驾驭现实人生的人格素养,也决定了其人生取舍。在余秋雨的人生轨迹中,担当行政职务,参与社会事务,都表现出了解现实人生、把握现实人生的努力。

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凝聚与再造是时代的大课题,余秋雨文化散文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个重要因素是他顺应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世致用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文化人格塑造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文化人格的塑造与建立不单单是以个体自我实现为目标,它向外应该有更广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开拓,向内应该有一种符合现代人文理想的人格操守做保证。对于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广大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人格尚处在进行状态,没有定型,文化人格似乎还只是一种言说,需要进一步的凝聚和彰显。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②1920年代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提出大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在越(会稽)”,当代浙江学者陈桥驿也延续了这个观点,参见陈桥驿《关于禹的传说及后来的争论》,《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